

文化景区(八)

蒙古扎萨克镇国公陵园

大安市新艾里蒙古族乡政府所在地东南约1.5公里处,沙岗怀抱的山坳里分布着数十座荒冢,这就是清代科尔沁部扎萨克镇国公的家族墓地遗址。

据资料记载,墓地原由7个大小不等的陵园组成,大者面积约150平方米,小者约100平方米,共占地25万平方米左右。

在九代扎萨克镇国公中,除第五代镇国公和第八代镇国公外,其他七代镇国公的坟墓都各建一个陵园。规模较中原地区公侯墓略小,设有牌楼、翁仲、华表等饰物,施工精细,磨砖对缝,榫卯相连,干摆灌浆,别具一格。可谓简而不陋,朴而不俗,不失庄严气派。

园内主陵,方形底座高约1米,陵室外形或圆或方,直径4.5至5米,高2.5至3米。陵墓正面均刻有死者名讳、生前职衔及卒年。墓室四壁和券顶,绘有彩色壁画,内容多为游猎、伎乐、宴饮等,形象地反映了墓主人一生的奢华生活。棺槨停放于墓室中央。棺前备有陶缸,缸内盛油,以供长明灯用。主陵之后,西侧有一略小于主陵的陵墓,东侧有较西侧略小些的陵墓。据蒙古族“西大东小”的习俗推断,西侧陵墓安葬的当为墓主人的正妻,东侧为其侧室。

墓葬地附近还建有陵界村。数百年来,先后有十户蒙古族百姓世代看守陵墓(称“鬼奴”)。逢年过节,他们要清扫陵园,点燃佛灯,到墓前焚香、磕头,除夕之夜,还要到陵园“守岁”。墓主人死后尚且如此排场铺张,可以想见生前如何奢靡。

新艾里乡成为扎萨克镇国公的家族墓地,是由这里特殊的地理位置和风光景物所决定的。据《清史稿》载,这一带丘陵逶迤东延,状若卧龙,龙头即今新艾里。而在“龙头”前,有清泉一泓(今安广镇龙泉泡),且左望嫩江,右挽洮儿河,后有群山作屏障,是一处难得的“风水吉壤”。遂将“龙头”之所在定为墓址。乾隆十九年(1754年),喇嘛扎布卒,始葬于此。其后第五至第十二代扎萨克镇国公死后均葬在这里。

当年,这里曾有一棵古榆,腰径数围,树高参天,被人们奉为“神树”,信其能降福消灾。每逢大旱,人们便募款捐粮,杀牛羊前来祭祀,并请喇嘛念经祈雨,还要在“神树”下搭灶安锅,煮肉煮粥,男女老幼齐集树下,享受“神树”赏赐的酒食,热闹非常。

由于长期的风剥雨蚀和战乱,渐使陵墓坍塌,如今陵园建筑已荡然无存,唯见一块残碑横陈于地,四周遍布残砖碎瓦。然而每当春夏之际,方圆几十里的学校仍组织师生到这里野游,附近的村民也在茶余饭后来这里散步游玩,陵园遂变成了公园。(白城市文联供稿)

B 白城记忆



蒙古扎萨克镇国公陵园

林则徐考场除弊

李向杰 蒋守昌

在位于六朝古都南京的中国科举博物馆内,珍藏着一份特殊的考场规约。这份长达近两千字的考场规约一共十二条,对惩治舞弊等作出明文规定,使当时科举考试中存在的一些乱象得到了有效整治。

这份考场规约的制定者,就是时任江苏巡抚林则徐。任江苏巡抚六年期间,林则徐三次担任江南乡试监考官,对科举考试弊端进行整治,留下“三度亲临棘闱中,雷厉风行革弊政”的佳话。

道光十二年(1832年)六月,林则徐任江苏巡抚。这年刚好是壬辰科江南乡试之年。按常规,江苏、安徽该科的监考官应由安徽巡抚担任,但道光皇帝破例指派林则徐担任。尽管林则徐接到诏令时离八月乡试的时间已经很近,但他一到江苏,立即遵照考场条例要求,将监考官应聘的事务预先做了布置。

林则徐重视对考官的管理,考官负责阅卷的重要工作,这是国家选拔人才的大事,必须慎之又慎。为此,林则徐做了以下几件事。其一,选用身体文雅俱佳的考官。清朝科举考试阅卷投入的人力和财力是巨大的,需要精力充沛和学识丰富的考官进行阅卷工作,但在直隶和各行省却大多由年老的举人充任,他们大多缺乏充沛的精力去认真批阅试卷。同考官中即使有近期考中的进士,由于他们后来大多经常处理文书簿籍、钱粮会计之类的事务,“文理日就荒芜”。各省的总督、巡抚虽按惯例考试选拔同考官等,也仅仅走个过场而已。

为此,林则徐认为只有合格的考官,才可能选拔出真正的人才。他对负责考试的各类人员包括同考、提调、监试、收掌等进行慎重挑选,任用了一批“文理优长精神振作之员”,淘汰了一批“年老荒唐庸滥充数”者。

同时,他专门对负责监考和阅卷的帘官进行考试,交卷时还会进一步要求他们注解所写词意的出处。不仅如此,林则徐还亲自出题两篇,要求帘官们详细评论文章的得失,并规定评语不许空洞泛泛。为了加强考官的责任心,林则徐还把自己过去三次担任考官时所作批语,印制成册,分发给考官们学习。

其二,制定主考及同考官批阅试卷要逐篇分批的章程。当时乡试阅卷中有同考官先推荐的毛病,同考官们在拿到第一场试卷后,大致浏览一遍后便定出好坏,将合意的放在一起,加批语后推荐给主考官;稍不满意的就归入落选试卷之列,不做任何批语。为了将自己推荐中选的考卷尽早供主考官参考,同考官们相互竞争赶时间推荐,对落选的试卷随意点评,敷衍了事。

于是,林则徐做出规定:除了第二、三场试卷的批语不作要求外,第一场的四篇文章必须每篇批出。凡是含糊字眼,如“欠精警”“少出色”等,一概不许使用。同时,林则徐还要在中选文章揭晓后,亲自将落选文章加以复查,如果发现首场文章不错,但却只点评了几行,将据实报告并给于处罚,以此来警告其他阅卷者减少惰性。如此一来,同考官们因有这些章程约束,阅卷不敢马虎、草率,对于衡量及选拔优秀人才大有好处。

其三,请求皇帝宽延阅卷时间。林则



林则徐

徐考虑到,仅正科乡试首场三篇文章一首诗,每份试卷就有两千多字,即使投入所有精力认真阅卷,每天也只能阅四五十份,而每个同考官一共要阅八百份,按此计算需二十多天才可阅完一场。为了将落选的试卷全部审阅一遍,林则徐奏请皇上在不超过揭晓最后期限的条件下,能否宽延几天。这样,时间充足,主考官和同考官或可仔细阅读,使人才不至于被遗漏。林则徐发现当时考卷中雷同现象非常普遍。原来,一些家塾教师充当“枪手”,帮人写文章,一篇可得二三百文制钱到一元洋钱不等。这些文章大多拼凑前人文章,一篇多卖,互相传抄,考生们或背诵或夹带这种“范文”,应用于考场上。由于各阅卷官水平不同,于是出现这篇文章被选中,而那篇却落选的情况。即使发现考生文章是这种事前炮制好的“范文”,事后对当事人也没有做任何处罚,使得那些靠这种手段而侥幸考中的人无所顾忌。

针对一些考生夹带“范文”资料等作弊情况,林则徐抓住作弊文章雷同化的特征,采取严厉手段。

除了在策问中援引的语句可以不管外,凡发现文章中有与儒家经典四书五经雷同达三行以上的便要严惩。全部批阅落选试卷后,发现与中选试卷雷同的,追查中选者,让雷同抄袭者很难蒙混过关。主考官将雷同抄袭者的名字记下来,揭榜后将名单交由林则徐亲自查办。凡正途贡生监生进入国子监读书的秀才,按照考场条例降一级,罚他们做对读生帮助校对试卷抄本。假如是花钱捐纳而进入国子监读书的人,以后不准参加应试。对全篇雷同抄袭的人,不管是谁,一律取消考试资格,永不再考。

与此同时,针对考场人员较多、进场拥挤、秩序混乱的问题,林则徐下令事先统计各省府、州、县参考士子的人数,根据人数多少,改原来一进门场为三门放行,并且把入场的时间、场门、顺序,制成清单。同时,在考场增设茶水饮食的供应点,尽可能地给士子考场生活带来方便。

在林则徐精心整顿下,江南贡院考场秩序焕然一新。尽管科举制度早已随着历史的兴替不复存在,但林则徐大刀阔斧整治科举考试歪风,坚持公道正派选拔人才的担当精神,以及在阅卷中细心勘误、爱护考生的品质,至今仍有积极意义。

走近古文字(下)——义的播迁

“止戈为武”到底错在哪里

熊建

头几年春节期间,看电视里有少林寺武僧团进行精彩的武术表演。台下有学者点评说,“武”字拆一下,是止戈为武,就是怎么能让干戈化为玉帛,让战争停止下来,这才是武字的本义。

这样解释武字,很流行。向世界传播中国文化中爱好和平、制止杀伐的基因,这事我举双手赞成,但是可以举的例子很多,偏偏“止戈为武”不在其列。

把武字的意思解释成止戈为武,曾见于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里。《说文解字》虽然伟大,但错误也有。小篆里的武字,是上戈下止。这个止字是象形,是趾的本字,表示人的脚。整个字形就是一个人扛着兵器“戈”行进。去干啥?去进攻,去打仗。这哪里有制止战争的意思?

当然,后世给武字赋予新的意义,新的内涵,这没问题,约定俗成即可,正恰恰说明了文字的意义是不断变化、不断丰富。但不能因此就用今天的理解去说明过去的字义,那无异于刻舟求剑。

清代学者段玉裁说过,文字的初始阶段,先有义后有音,有了音之后才有

了形,是义一音一形。而人们学习研究文字的过程正好相反,是先看到形,再得到音,知道了音才能明白义,是形一音一义。

中国语言学分三门:文字学——研究字形、音韵学——研究语音、训诂学——研究语义。训诂学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开始萌芽了,到汉代有了极大的发展,确立了两种基本的体式,流传至今。一个是随着文章行文注释字义、词义、文义的注疏,一个是字典、词典之类的专著。

前者最有名的莫过于“四大名注”:南朝宋裴松之《三国志注》、北魏

郦道元《水经注》、南朝梁刘孝标《世说新语注》、唐李善《文选注》。他们的注解范围远远超过了对一字一词的解释,是把诸多相关史事、其他书里的资料,大段大段地一并列上,以至于有时候注解的文字比正文还多。

后者最有名的莫过于第一本字典《说文解字》。许慎认真地解释了9353个字的意思,并说明了每个字的造字法。可以说,要想真正读懂古书,就离不开《说文解字》。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有人问钱钟书为什么不招研究生。他说:“先把《说文解字》读通了再来考研究生也不迟,字都认不全,谈

什么博士?”训诂方法有很多,简单说一个,因声求义,就是声音相同或相近的字,其义也相同或相近。比如我们常说,做人要讲义气,要有道义,这个义字什么意思?古人说了:“义者,宜也。”用同音字“宜”来解释“义”。宜就是应该的意思。在中国人眼里,行义,就是做应该做的事。

传统训诂的弊端也不少,除了“止戈为武”是典型的拆字为训之外,还有一个繁琐寡要的毛病。西汉有位学者秦恭,解释《尚书》里“曰若稽古”这4个字,竟然用了3万字。不过,一个字也没流传下来。

某些学者的大部头著作,对某一词的阐释,对某一事物的说明,看似洋洋洒洒,实则空洞无物,比起秦恭,恐怕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吧。

古书今读

三、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和土地制度的改革

经过一年多的作战,人民军队先后挫败国民党军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使战争形势发生了有利于人民的变化。到1947年6月,人民军队歼敌112万人,国民党军队的总兵力由战争开始时的430万人减少到373万人,其中正规军由200万人减少到150万人。人民军队发展到195万人,武器装备也得到很大改善。

蒋介石为摆脱困境,凭借军队数量和装备上的优势,企图将战火继续烧向解放区,进一步破坏和消耗解放区的人力物力。

依据整个战局的发展,中共中央作出重大的战略决策:不等完全粉碎敌人的战略进攻,不等解放军在数量上占有优势,立刻转入全国性的进攻,以解放军主力打到外线,调动敌人回防空虚的后方,粉碎蒋介石的战略企图与方针,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域,迫使敌人转入战略防御,改变敌我之间的攻防形势。中共中央选择地处中原的大别山区作为战略进攻的主要突击方向。

为了实现这个战略计划,在中共中央的部署下,人民军队逐步形成三军配合、两翼牵制的作战格局。根据当时的战争形势,三军的配合是:以刘伯承、邓小平指挥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为中路,实施中央突破,直奔大别山;以陈毅、粟裕指挥的华东野战军主力即西线兵团为东路,挺进苏鲁豫皖地区;以陈赓、谢富治指挥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一部为西路,挺进豫西。三路大军相互策应,机动歼敌。两翼的牵制是:以西北野战军出击榆林,吸引进攻陕北之敌北调;以华东野战军东线兵团在胶东展开攻势,将进攻山东之敌牵向海边。

1947年6月30日夜,刘邓大军12万人强渡黄河,发起鲁西南战役,揭开人民解放战争战略进攻的序幕。刘邓大军从国民党数十万军队的前堵后追中杀开一条血路,穿越黄泛区,渡

过沙河,抢渡汝河和淮河,于8月末进入大别山区。刘邓大军依靠人民群众,艰苦作战,粉碎20万国民党军队的轮番进攻,至11月歼敌3万余人,建立33个县的民主政权,站稳了脚跟。

与此同时,陈谢大军和陈粟大军在党中央指挥下分别进入豫陕鄂边地区和豫皖苏平原。至此,三路大军都打到外线,形成“品”字形进攻阵势,直接威胁南京、武汉。12月,三路大军协同粉碎了国民党军对大别山的重点围攻。中原地区变成人民解放军夺取全国胜利的前进基地。

继续在内线作战的彭德怀率领的西北野战军,谭震林、许世友率领的华东野战军东线兵团,聂荣臻率领的晋察冀野战军,徐向前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太岳兵团等,也渐次转入反攻。林彪、罗荣桓率领的东北民主联军连续发动秋季攻势和冬季攻势,歼敌20多万,为全歼东北国民党军创造了有利条件。

人民解放军在内线和外线的攻势作战,组成人民解放战争全国规模的战略进攻的总态势。国民党军队不得不从战略进攻转变为“全面防御”,人民军队由此结束了长期以来在国内革命战争中所处的战略防御地位。这标志着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已经达到一个新的历史转折点。毛泽东指出:“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1947年10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表宣言,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接着,中共中央召开十二月会议,毛泽东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报告,制定了彻底打败蒋介石,夺取全国胜利的政治、军事、经济纲领及一系列方针政策。据此,1948年4月,毛泽东把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进一步概括为:“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

第四章 夺取民主革命的全国胜利

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新形势,要求在解放区更加普遍深入地开展土地制度改革,以进一步调动广大农民的革命和生产积极性,支援解放战争。1947年7月至9月,在刘少奇主持下,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召开全国土地会议,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这个彻底的反封建的土地革命纲领,明确规定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解放区各级领导机关派出大批土改工作队深入农村,发动群众,组织贫农团和农会,控诉地主,惩办恶霸,彻底平分地主土地,迅速形成土改热潮。

为了使土改顺利进行,各解放区普遍开展以“三查”(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和“三整”(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为内容的整党运动,采取党内党外结合等方法,解决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思想作风和成分不纯问题。经过整党,农村基层党组织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有了很大进步,为土改和解放战争的胜利提供了重要的保证。

在土改运动迅猛发展的过程中,一些地区发生侵犯中农和民族工商业者利益、对地主乱打乱杀等“左”的偏向。中共中央发现后采取坚决措施加以纠正,并明确规定了土改工作的总路线总政策,即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此后,土改运动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

全国各解放区的土改运动取得巨大成绩。到1948年秋,在一亿人口的地区消灭了封建的生产关系,长期遭受地主阶级残酷压迫和剥削的广大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翻了身,生产积极性大为高涨,大批青年加入人民军队或担任战争勤务,从而保证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进行。

党领导的第二条战线斗争有了新的发展。1947年10月,

杭州、南京、上海等城市的十余万学生掀起“反对非法逮捕、反对特务、反对屠杀青年”的斗争浪潮。1948年初,上海、北平等地学生的反迫害斗争再次出现高潮。4月,华北学生开展“反对迫害、保卫学联”的斗争,形成声势浩大的四月风暴。五六月间,全国兴起反对美国扶持日本军国主义的爱国运动。

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日益倾向于人民革命,积极参加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斗争,因而遭到国民党的监视和残酷迫害。民盟中央领导人李公朴、闻一多、杜斌丞先后在昆明、西安被害,许多民盟成员被捕或绑架。1947年10月,国民党当局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予以取缔。曾经在部分民主人士和中间阶层中有过影响的“中间路线”的政治主张彻底破产。

人民解放战争转入战略进攻并取得节节胜利,形势,中国共产党的团结争取和鼓励支持,促使各民主党派和许多民主人士在政治上实现了历史性的转变。1948年1月,民盟领导人沈钧儒等在香召开民盟一届三中全会,恢复民盟总部,宣布要与中国共产党“携手合作”。国民党民主派实行联合,在香港正式组成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选举产生宋庆龄为名誉主席、李济深为主席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布“当前之革命任务为推翻蒋介石卖国独裁政权”。与此同时,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九三学社、中国致公党、台湾民主自治同盟都明确表示了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立场。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号召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各民主党派、各阶层代表人士热烈响应,并陆续摆脱国民党的阻挠,通过各种渠道进入解放区,参与筹备召开新政协、建立新中国的工作。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发展,奠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基础。(20)